

## 鯨濤千里傳梵音：

# 《佛學叢報》與近代佛教歷史書寫轉型之日本因素

釋道禮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碩士班三年級

### 摘要

近代佛教改革僧人太虛大師，1925年曾在《海潮音》評論中國佛教的歷史敘述：「僅詳事實，關於教理變遷之原因程式，猶少系統之研究。」湯用彤亦言：「中國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學。宗教情緒，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須有之史實為象徵，發揮神妙之作用。」均道出中國佛教歷史研究的問題所在，即缺乏歷史事實前因後果的脈絡敘述與未跳脫宗教特有的神話歷史。審視傳統佛教的典籍中，現存大約兩百部的中國古代佛教史籍，觀察其內容，多是記錄一人或是一宗的傳記，至於佛教盛衰之蹤跡，很難有系統地看出整體面貌。近代中國受到西學的影響，佛教歷史書寫在傳統與現代交替的過程中，已由傳統的宗門與判教的撰寫型態，轉型成為具現代通史性質的歷史分期之寫作方式，當中日本方面的影響著實功不可沒。

近代最早使用科學客觀的佛教歷史書寫方式，可溯源至日本明治時期，村上專精於明治二十七年（1894）創刊《佛教史林》，首次嘗試結合近代學術與宗教的義理來詮釋佛教歷史。中國方面佛教史研究的日本因素亦不容忽視。《佛學叢報》收錄楊仁山所著《十宗略說》，即是以日書內容為基底撰成。1928年由蔣維喬所寫《中國佛教史》，被稱為中國第一部佛教通史，亦是參考日人著作而完成。值得注意的是，相較如蔣維喬以日書為參考對象的中國佛教歷史著作，1912年的《佛學叢報》則是最早直接翻譯日人的佛教史書籍，原汁原味地介紹給中國人閱讀，此種翻譯刊載的形式，亦讓其後出版的佛教刊物爭相仿效。近代以來，日本借鑑西方人文科學研究方法研究佛教，成果頗多，並傳回中國，影響一代中國佛教學人。以此審視日本明治時期在西學衝擊下所作出佛教歷史的研究成果，影響一代中國佛教學者，佛教學者在研究佛教歷史並著其作時，常以日人著作的日本佛教書籍與研究成果為參考範本，亦奠定了現代佛教歷史書寫的基礎。

**關鍵字：**佛教歷史書寫、判教、《佛教史林》、《佛學叢報》、西學衝擊

## 一、前言

佛教在中國的落地生根，相較於佛教發源地的印度，不啻發展出屬於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並開枝散葉，傳播至朝鮮、日本、越南諸國，也在這些國家重新形成屬於自己本土風格的佛教文化。中國佛教向來以宗派、祖師為其特色，十三個宗派的成立，標幟著大乘佛教的蓬勃事業。當中，因宗派間相互競爭使然，各自認為本宗才是直接繼承釋迦牟尼佛的正統，為了闡述此種地位，編纂史籍，將本宗傳統與印度傳承相銜接，<sup>1</sup>也成為佛教史書著述繁多的原因之一。事實上，宗派在佛教歷史上的意義固然不可抹滅，然更重要的是，一本貫通內外古今的佛教通史，似乎才是能符合想快速理解佛教歷史整體演變之人們的需求。

近代中國在西力東漸的歷史環境下，知識分子一旦想要知悉世界知識，便可隨其關懷，自由進出與西學有關的「知識倉庫」。當中，日本對中國的典範意義，漸次為世眾認可。<sup>2</sup>不同於傳統以判教來認識佛教歷史，近代中國對於佛教歷史的撰寫，很大程度是受日本影響，使用西方客觀的、科學的、以史料為主的書寫方式，此種方式排除傳說與神話，形成一個讓人重新思考佛教歷史的議題，此議題起了一個知識上的「傳播」作用，也可稱為「知識轉型」。

本研究旨在討論傳統與現代交織的時代格局裡，溯源近代佛教歷史的著作，最早使用科學客觀的重新書寫方式是發生在日本明治時期，是如何影響中國一代佛教界知識分子對於佛教歷史意識型態見解的轉變？中國著名知識份子梁啟超（1873-1929）在 1902 年所寫的〈新史學〉，造成中國史學思想革命，注重科學史學、啟蒙史學與演化史觀，<sup>3</sup>影響中國一代學人歷史研究的視野。而在 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初，中國佛教歷史研究在民國佛教期刊中是如何顯露佛教歷史書寫繼往開來的關鍵意涵？民國佛教期刊的作者，在傳統判教的論述基礎上，是採用哪些西方客觀的、科學的、以史料為主之更宏觀的角度書寫佛教歷史？此種排除「喜偏護所宗一派學說」的史觀，<sup>4</sup>形成一個佛教歷史「知識轉型」的概念，民國佛教期刊的撰稿人又是如何接受思考「知識轉型」這樣的意識，來重新理解佛教的歷史？

本文研究方法為歷史文獻分析法。首先，嘗以筆者赴日取材「日本國會圖書館」與「東京大學」珍藏之明治時期佛教史著作等相關文獻，諸如明治時期村上專精（むらかみ せんしょう，1851-1929）與鷺尾順敬（わしお じゅんきょう，1868-1941）編輯的《佛教史林》雜誌；境野哲（さかいのさとる，1871-1933）所著的《支那佛教史綱》、《支那佛教史講話》，與其遺稿整編而成的《支那佛教精史》；伊藤義賢（いとう よしかた）的《印度支那佛教通史》；井上政共（いのうえ まさしども）的《通佛教演講錄》等，理解近代日本明治時期佛教歷史書寫受到西

<sup>1</sup> 藍吉富，〈中國佛教史學的規模及其特色〉，《中國佛教泛論》，頁 13。

<sup>2</sup> 潘光哲（2014），《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頁 17、2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sup>3</sup> 黃克武，〈梁啟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之追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2003.9），頁 181。

<sup>4</sup> 呂澂（2009），《佛教研究法》，黃懺華，《佛學概論》，頁 49，揚州：廣陵書社。

方新式科學影響下之變革。再者，使用近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輯的《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當中共收錄了一百四十八種佛教刊物，是目前收集最完整的中國佛教期刊合集，編者稱為「當代佛教大藏經續編」。黃夏年指出：「民國時期佛教文化復興活動，是近現代佛教振興運動中最重要的一環。這一時期，佛教界先後辦刊出報近三百種，現在已經能見到的達 256 種，未見有名的尚有 30 餘種。」<sup>5</sup>這些佛教刊物所具之特色主要是在參與者廣，文章反映佛教界各種創刊團體的訴求等，雖然出版時間有長有短，但均從各個側面反映了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最終，本文期望試圖通過探究《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有關中國學人的歷史文章與翻譯清末民初日本學人歷史書籍，及日本明治時期之佛教歷史著作，釐清近代中國佛教歷史書寫之日本因素，與近代中國佛教歷史書寫與佛教歷史觀轉型之歷程，藉此提出對於現代佛教歷史意識所具之意義。

## 二、民初首份中文佛教期刊——《佛學叢報》

《佛學叢報》創辦人狄葆賢（1873-1941），為清末民初著名的新聞出版家，其於光緒三十年（1904）於上海創辦《時報》，以輿論鼓吹革命。入民國後，復陸續增出教育、實業、婦女、兒童、英文、圖畫、文藝等週刊，均為各報倣行。為保存國粹及提倡東方文化，出版《佛學叢報》，延佛學基底深厚的濮一乘為主編，首以文字宣傳佛法，頗有啟發作用。民國二年（1913）之《佛教月報》，民國七年（1918）之《覺社叢書》，顯都受其啟發而出。<sup>6</sup>

光緒三十年（1904）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被視為維新派刊物的《東方雜誌》，<sup>7</sup>是一份頗具影響力的大型綜合刊物，其內容豐富，涵蓋了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學價值。<sup>8</sup>《東方雜誌》於 1911 年 11 月 15 日出版完第 8 卷第 9 號後暫時停刊，1912 年 4 月 1 日復刊出版第 8 卷第 10 號，因政治變動之因素，刊物態度從支持立憲轉為支持共和。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前，《東方雜誌》當中有一個欄目為「宗教」，記載著有關佛教、基督宗教，以及回教等新聞與論說。但在復刊之後，欄目有作調整，幾乎已看不到關於佛教新聞的部分。然而，1912 年 10 月 1 日《佛學叢報》的出版，設立了「記事」一欄，專門報導佛教界的新聞，並影響其後的佛教刊物與之效法。故《佛學叢報》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延續《東方雜誌》關於佛教新聞的記載。

狄葆賢於上海創辦的有正書局，出版發行單本佛經和佛學通俗讀本，價位低廉，使一般人都容易購得，通俗易懂，易引起一般人學習佛法的興趣，<sup>9</sup>故對佛教教義傳播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近代知識份子研究佛學的管道，大多從佛教的出版書局購得佛教書籍及期刊雜誌來閱讀，這些知識份子日記裡時常有著相關記錄，

<sup>5</sup> 黃夏年，〈民國時期的佛教報紙——《稀見民國佛教文獻彙編（報紙）》序言〉，《法音》1（2007.1.25），頁 39。

<sup>6</sup>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 646。

<sup>7</sup> 商務印書館（1904-1948）。《東方雜誌》，上海：商務印書館。

<sup>8</sup> 朱迪（2013），《試析《東方雜誌》關於宗教問題的報道與評論（1904-1937）》，頁 1，吉林：吉林大學碩士論文。

<sup>9</sup> 游有維（1988），《上海近代佛教簡史》，頁 62，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如梁漱溟（1893-1988）的自學，最得力於雜誌報紙，許多專門書或重要典籍之閱讀，常是從雜誌報紙先引起興趣和注意，然後才找來閱讀，中國的經書乃至佛典都是如此。<sup>10</sup>

讀者若閱覽《佛學叢報》，不難發現在十二期的《佛學叢報》中關於佛教歷史的文章，從第一期首篇〈中華民國之佛教觀〉，中間期的〈三國佛教略史〉、〈西藏佛教略史〉、〈十宗略說〉、〈佛教歷史問答〉、〈法性宗之傳承〉，一直到最終期的〈釋迦牟尼佛傳〉，佔據最多的篇幅，作者不限於中國人，日本學者的著作也在《佛學叢報》翻譯連載，這顯示出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因傳統重視佛教義理的學問研究，而被長期處於從侍地位的佛教歷史研究，在近代逐漸顯露頭角，開始被研究者們所關注，並打破以往判教史觀，重新以現代科學研究法撰寫的佛教歷史著作，也推陳出新地接連出書。此趨勢非一朝一夕所形成，也非單純僅在中國本土所興起，必須放入近代的歷史脈絡與環境變遷中廣泛考察，尤其日本因素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 三、日本佛教歷史書寫的改革及對中國佛教之影響

近代佛教改革僧人太虛大師（1890-1947），1925年曾在《海潮音》評論中國佛教的歷史敘述：「僅詳事實，關於教理變遷之原因程式，猶少系統之研究。」<sup>11</sup>湯用彤（1893-1964）亦言：「中國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學。宗教情緒，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須有之史實為象徵，發揮神妙之作用。」<sup>12</sup>均道出中國佛教歷史研究的問題所在，即缺乏歷史事實前因後果的脈絡敘述與未跳脫宗教特有的神話歷史。審視傳統佛教的典籍中，現存大約兩百部的中國古代佛教史籍，觀察其內容，多是記錄一人或是一宗的傳記，至於佛教盛衰之蹤跡，很難有系統地看出整體面貌。

中國自魏晉南北朝時期，從印度傳入中國大量的三藏典籍被學者譯出，中國佛教徒對其典籍內容的認定不同，而有「判教」思想的產生，如天臺宗五時說的分類，將佛教經典的成立歷史作了明確的分期。然此種按照時間順序的判別方式，是根據教義需求編排而出，並未能代表經典產生先後的真實歷史次序。呂澂（1896-1989）才會批判：「我國昔時佛教史家頗多，著作亦見繁出。但有一通病，喜偏護所宗一派學說，而不能持公平的態度。」<sup>13</sup>例如宋朝釋志磐所撰《佛祖統紀》，卷軸浩繁，不失為一大通史，然著者為天臺宗門人，偏從五時八教之說，便很難

<sup>10</sup> 梁漱溟：「我尋求佛典閱讀之，蓋始於民國初元，而萃力於民國三年前後。於其同時兼讀中西醫書。佛典及西醫書均求之於當時琉璃廠西門的有正書局，此為上海有正書局分店。據聞在上海主其事者，為狄葆賢，號平子，又號平等閣主，崇信佛法，《佛學叢報》每月一期，似即其主編。金陵刻經處刻出之佛典，以及常州等處印行之佛典，均於此流通，任人覓購。《佛學叢報》中有李證剛（翊灼）先生的文章，當時為我喜歡讀。」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2005），《梁漱溟全集》，頁669、692，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sup>11</sup> 釋太虛，〈會昌以前中華佛教之三大系〉，收錄於《太虛大師全書》第2冊，頁869，新竹：善導寺佛經流通處，1980。

<sup>12</sup>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頁87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2，3版。

<sup>13</sup> 呂澂，《佛教研究法》，黃懺華，《佛學概論》，頁49。

顯露佛教歷史的真相，此為佛教史學殊為可惜之處。

近代中國受到西學的影響，佛教歷史書寫在傳統與現代交替的過程中，已由傳統的宗門與判教的撰寫型態，轉型成為具現代通史性質的歷史分期之寫作方式，當中日本方面的影響著實功不可沒。釋東初（1908-1977）曾論析日本佛教研究的世態：「明治以前的日本佛教，乃承繼我國佛教研習的風格。明治以後，由於日本接受西方文化，佛教也隨之採取西方治學的方法，而以歷史進化論的方式，哲學的觀念，來衡量佛法。」<sup>14</sup>呂澂的觀點則是：「日本方面關於佛教史之研究，因能兼用我國及西歐之資料，故所造詣亦頗楚楚可觀。」<sup>15</sup>東初認為日本的佛教史研究是取汲西方進化論的方法，呂澂更指出包括中國佛教的材料。

近代最早使用科學客觀的佛教歷史書寫方式，可溯源至日本明治時期，村上專精（むらかみ せんしょう，1851-1929）於明治二十七年（1894）創刊《佛教史林》，首次嘗試結合近代學術與宗教的義理來詮釋佛教歷史。迨至中國著名知識份子梁啟超（1873-1929），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著《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之〈佛學時代〉這一章節，首次將佛學作為中國歷史的一個階段寫進中國學術史。梁氏除吸收日本佛教歷史書寫方式，取材自日人所著《八宗綱要》、《十二宗綱要》、《佛教各宗綱領》等書，更加進佛教歷史之「發端」、「佛學漸次發達之歷史」、「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偉人」等撰寫內容，可代表佛教歷史書寫轉型的現代意義，當時佛學界亦慢慢接受梁啟超這種詮釋觀點。

中國方面佛教史研究的日本因素亦不容忽視。《佛學叢報》收錄楊仁山所著《十宗略說》，即是以日書內容為基底撰成。1928年由蔣維喬（1873-1958）所寫《中國佛教史》，被稱為中國第一部佛教通史，亦是參考日人著作而完成。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以日書為參考對象的中國佛教歷史著作，1912年的《佛學叢報》是最早直接翻譯日人的佛教史書籍，原汁原味地介紹給中國人閱讀，此種翻譯刊載的形式，亦讓其後出版的佛教刊物爭相仿效。《佛學叢報》譯刊之1890年由島地默雷（しまじ もくらい）與生田得能（織田得能，おだ とくのう）合著的《三國佛教略史》，分述印度、中國、日本三國之佛教史，以及1902年永井龍潤（ながい りゅうじゅん）所寫《通俗佛教歷史問答》，即在此環境背景下成書。若反觀明治時期（1868-1912）有關佛教史的著述繁多，《佛學叢報》何以挑選這幾本日書在1912-1914年連續刊載？其意義何在？

日本在奈良時代已有《延曆僧錄》等僧傳被著述，特別是到了鎌倉時代，有凝然的《三國佛法傳通緣起》與虎関師鍊（こかんしれん，1278-1364）的《元亨釋書》等佛教史書被編撰。當中，《三國佛法傳通緣起》試圖立足印度、中國、日本三國史觀，欲寫成一本綜合性的佛教史，然成書軸心仍以諸宗派的教學系譜為主。到了近世，成書了如師蠻（しばん，1626-1710）《本朝高僧傳》這類大部頭的僧傳，漸趨開始以考證方式撰寫佛教史，但是，作為佛教通史性質方面的歷史敘

<sup>14</sup> 釋東初撰，中華佛教文化館、中華大典編印委員會同編（1970），《中日佛教交通史》，頁668，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

<sup>15</sup> 呂澂，《佛教研究法》，黃懺華，《佛學概論》，頁40-41。

述，還是未能超越《三國佛法傳通緣起》的層次，即缺乏打破宗派史觀來以統合的角度洞察佛教歷史。江戶幕府時代，雖有德川光圀（とくがわ みつくに，1628-1701）主持編纂的《大日本史》，以及嘉永元年（1848）真宗大谷派僧人可庵（かあん）編集《國史佛法鈔》，然前部基於儒學與神道的立場，「佛事志」的部分多含排斥的意味，後部則僅從「六國史」中摘錄，很難稱得上是「佛教歷史」。

16

迨至明治時期，「佛教界面臨的根本課題，是對傳統佛教進行適應近代社會的改造」<sup>17</sup>。佛教歷史書寫亦復如此。為了將佛教史研究推廣至社會，由村上專精（むらかみ せんしょう，1851-1929）同鷲尾順敬（わしお じゅんきょう，1868-1941）與境野哲（境野黃洋，さかいのさとる，1871-1933）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創刊的《佛教史林》，此雜誌可說包含學術和宗教（信仰）兩種成分，其價值被現代佛教學者末本文美士（すえき ふみひこ）譽為「終於寫下了作為近代學術的佛教史研究的第一步」這樣的地位。<sup>18</sup>審視《佛教史林》，創刊號卷頭發刊辭，是為了「敘述佛教史研究的必要性，作為發刊的由來，並且表白本雜誌的宗旨目的」<sup>19</sup>。揭示著嶄新的學問宣言。根據 1914 年村上在《六十一年》當中〈「佛教史林」發行當時の追懷〉的回憶：

傳統以來，歷史意識的缺乏，是東洋（日本）的特徵，尤其是在歷史上，講佛教史的人很少。……歷史思想缺乏的結果，在教理研究上面，易失諸正鵠。迨我輩去到東京，見聞西洋式的新式研究法，雖然有諸多的學問，然而不從歷史角度來研究它的人可說是一個都沒有。哲學有哲學史的研究法，倫理學有倫理學史的研究法，……這就是西洋式的新式研究法。<sup>20</sup>

引文可知，日本傳統對於歷史意識缺乏的弊病，藉由明治時期從西方引進的新式研究法，開展了村上的研究視野，開始重新評估日本的學問，尤其是歷史研究方面。村上進一步反思，日本是個佛教的國家，除去了佛教史，日本歷史就無法成

<sup>16</sup> 荻野由之，〈佛教史研究に對する希望〉，《佛教史學》1（6）（1911.9.1），頁 51-53。「六國史」包括《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以及《日本三代實錄》。

<sup>17</sup> 明治維新迎來了日本作為近代國家成熟發展的階段，在「文明開化」號令中取效西方，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成為日本知識界的風尚。佛教界方面，雖受「神佛分離令」與「廢佛毀釋」衝擊，但也因一批有志者痛定思痛的努力下，使日本近代的佛教研究日趨成熟，成果豐碩。明治初年的「神佛分離令」，與設置宣教使後的種種舉措，使神道成為國教，實施神道與天皇為核心的「祭政一致」，長期以來在幕府保護下享有特權的佛教受到直接衝擊。這對早在幕末晚期已露端倪的排佛風氣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全國興起「廢佛毀釋」的浪潮。佛教界有志者痛定思痛，除積極派遣留學僧赴海外學習與考察，建立學校，並藉由創辦佛教報刊來推動佛教革新。楊曾文、張大柘、高洪著（2011），《日本近現代佛教史》，頁 49、91、94，北京：崑崙出版社。

<sup>18</sup> 末本文美士、松尾剛次、佐藤弘夫等編輯（2011），《近代国家と仏教》，頁 332-333，東京：佼成出版社。

<sup>19</sup> 村上專精，〈佛教史研究の必要を述べて發刊の由來となし併せて本誌の主義目的を表白す〉《佛教史林》1（1895.4.8），頁 1

<sup>20</sup> 村上專精（1914），《六十一年》，頁 293、296，東京：丙午出版社。

立。然觀察日本儒學者中有熟讀中國二十一史的經學家，或是熟讀國史的國學者，神道本身是在日本歷史上成立的，故無論是經學家、國學家，以及神道者，多少都要具備歷史的觀念，唯獨日本的佛教徒缺乏歷史思想。<sup>21</sup>村上繼之而寫的《日本佛教史綱》，繼承以《三國佛法傳通緣起》之諸宗派為中心的論點，再加上該時代的政治關聯與制度的變遷，則被日本學界認為是全面性歷史敘述的展開，影響到後來日本佛教史的研究。

值得關注的是，村上專精既闡釋宏觀的佛教歷史，接著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寫了《佛教統一論·大綱論》一書，從歷史角度考證出「大乘非佛說論」，無疑為日本學界投下顆震撼彈。明治三十六年（1903）又著《大乘佛說論批判》，來反駁那些批評他為「排佛論者」的人們，展開正面的論戰，批判近世以來日本學界如富永仲基（とみなが なかもと，1715-1746）、德門普寂律師（とくかど ひろしさび，1707-1781），以及井上圓了（いのうえ えんりょう，1858-1919）等主張的「大乘佛說論」，並一路影響至中國學界，如章太炎（1869-1936）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的〈辨大乘起信論真偽〉，及梁啟超在 1922 年的《大乘起信論考證》等，均將此說的戰火從日本帶往至中國知識界。審閱村上的見解：「大乘佛說論是純然是歷史問題，而非教理的問題；是學術的問題，而非信仰的問題。」<sup>22</sup>實可視為近代佛教史學科學研究的開端，即將佛教中的純歷史學術研究與經典教理分開討論，較能取得客觀認知。

日本關於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則是以境野哲（境野黃洋，1871-1933）為先行者。道端良秀（みちばた りょうしゅう，1903-？）於 1937 年回顧了明治時期以來，18 本中國佛教史的專門著作，發現這些所謂的「通史」，大部分是「教科書」的形式。<sup>23</sup>審視近代的佛教歷史研究，明治時期實屬開創階段，一本具教科書性質的佛教通史，確有其相當的重要性。教科書當中亦有佼佼者，以境野哲所著的《支那佛教史綱》、《支那佛教史講話》，與其遺稿整編而成的《支那佛教精史》，則是「奮勇前進至前人未踏的世界，開發了許多的新研究，解決了諸多的疑問」<sup>24</sup>。同時期中國學者夏曾佑（1863-1924）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出版《中國歷史教科書》，對於「教科書」形式的歷史書籍曾解釋：

史學廢，則於本國之事蹟，茫然其知，必將自忘其為何國之人，而亦無以動其效法前賢、護衛本國之事蹟。……就史而言，則當別編一教科書以教學者，必其於古今之歷史洞識其重要而已。<sup>25</sup>

夏氏觀點，讀史能知往鑒今，此時須有一本能言簡意該於古人，理論內容富於往籍的教科書，其功用能讓讀者快速理解歷史概貌。當時所謂的教科書，其史料運

<sup>21</sup> 村上專精，《六十一年》，頁 294、297。

<sup>22</sup> 村上專精（1903），《大乘佛說論批判》，頁 4-5，東京：光融館。

<sup>23</sup> 道端良秀，〈「支那佛教史」の既刊書概観〉，《支那佛教史學》1（1）（1937.4），頁 123。

<sup>24</sup> 道端良秀，〈「支那佛教史」の既刊書概観〉，《支那佛教史學》1（1）（1937.4），頁 125。

<sup>25</sup> 夏曾佑著，楊琥編（2011），《夏曾佑集》，頁 399，上海：上海古籍。

用的內容基底頗為紮實，且夏氏此書還帶有天演進化論的觀點，頗得嚴復喜愛，將之評為曠世之作。<sup>26</sup>

近代中國佛教學者所寫中國佛教史書，使用日書為底本的現象亦值得關注。據釋東初的研究發現，太虛大師在 1922 年創辦的武昌佛學院，即由史一如（1876-1925，法號慧圓居士）將《支那佛教史綱》譯成漢文，名為《中華佛教史》，作為佛學院教材。「民國十一年（1928），蔣維喬先生採用慧圓居士譯本，首尾增加兩章，名曰《中國佛教史》，……故蔣氏之中國佛教史，即境野黃洋之《支那佛教史綱》的前身」<sup>27</sup>。蔣維喬在《中國佛教史》記錄其成書背景：「是書以日本境野哲所著《支那佛教史綱》為依據。惟原書所引事實，不免錯誤，訛字尤多。今檢閱《正續藏經》，於其錯誤者改正之，缺略者亦補之。」<sup>28</sup>蔣維喬撰寫此書的出發點，是因於佛教義理方面，中國有特別發達的學問，多有獨自成宗者，但卻並不注重佛教歷史的研究，至今沒有可供參考的系統典籍出現。歷史之研究，實足為教理之輔助。<sup>29</sup>該書則被稱之為第一部「名實相符的系統的中國佛教通史」。<sup>30</sup>

有趣的是，同樣以中國佛教史為中心，若觀察上述日人所寫佛教史書的關懷處，可總結成三種不同類型：第一種是為了理解印度佛教，向下從傳入中國後的佛教找尋其思想資源，如橘慧勝的《支那佛教思想史》；第二種是為了更加理解日本佛教，向上溯源至中國佛教，尋求其傳來的影響與變化，境野哲的研究徑路即屬此類；第三種則是以教團史與文化史等為中心，直接深入中國的研究，是昭和時期正在進行的研究項目。

比起作為研究先驅的《佛教史林》，抑或道端良秀羅列日本所著的中國佛教史著，更早於它們在日本出版的《三國佛教略史》，較被研究者所忽略，但它卻早在 1912 年即被《佛學叢報》開始翻譯連載。

#### 四、《佛學叢報》的中譯日文史籍

近代中日佛教界往來頻繁，上海佛教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大多數與日本佛教界所有接觸。<sup>31</sup>戊戌變法失敗後，狄葆賢二度至日本；任狄葆賢《時報》主筆的包天笑（1876-1973），亦曾應日本各新聞社對於上海各報館記者的邀約，隨上海記者團赴日考察日本新聞事業，如大阪的朝日新聞。<sup>32</sup>由此觀之，《佛學叢報》收錄譯刊以日書為主，有《三國佛教略史》、《佛教歷史問答》，以及〈釋迦牟尼佛傳〉，其背景因素與出版地位於上海有極大關係。

審視《三國佛教略史》，可知學人若欲研究佛教史，先應明瞭佛教傳播之地域。以佛教創始之地印度為始，分布範圍極為廣泛，南由錫蘭漸傳於緬甸、暹羅（泰

<sup>26</sup> 嚴復著，孫應祥，皮後鋒編（2004），〈與夏曾佑書〉，收錄於《嚴復集》補編，頁 263，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sup>27</sup> 釋東初撰；中華佛教文化館，中華大典編印委員會同編，《中日佛教交通史》，頁 696。

<sup>28</sup> 蔣維喬（2013），《中國佛教史》，頁 1，北京：人民東方出版傳媒有限公司。

<sup>29</sup>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頁 291。

<sup>30</sup>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頁 292。

<sup>31</sup> 阮仁澤，高振農主編（1992），《上海宗教史》，頁 32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sup>32</sup> 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中）（1990），頁 511-531，臺北：龍文出版社。

國)、南洋等地，北則從中亞、西域傳自中國、朝鮮、日本等地，誠如呂澂所言：

然變遷最著而史實足徵者，惟印度、中國、日本三地，即古來所稱三國佛教也。……《三國佛教略史》，全部三卷，分述印度、中國、日本三國之佛教教會史，為日人最初之佛教史書以日文著述者。體裁用編年式，而材料多不能脫舊傳之範圍，斯為可憾。十餘年前，我國曾有譯本刊行。<sup>33</sup>

呂澂一方面肯定印度、中國，以及日本三地佛教史的重要性，指出《三國佛教略史》此本日人最早用日文書寫得佛教史著作，另一方面又感嘆作者未使用新穎的材料。但《三國佛教略史》作為中國近代最早被刊譯介紹給予知識份子們的佛教史書，其價值地位頗值關注。

作者島地默雷與織田得能，均為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僧人，《三國佛教略史》基本上承續凝然《三國佛法傳通緣起》以印度、中國、日本為主的討論範圍，不同於凝然的宗派史觀，《三國佛教略史》是以佛教史實發展順序為書寫形式。檢閱其序言，可知此書寫作的特色與要點：

佛出世入滅，年時傳述不同，古來已有三十三種之異說。……佛降誕月日，亦有異說。……出家成道年時，亦有異說。……成道日月，諸說亦不一。……本史編修之意，欲充教科業書用。

島地默雷與織田得能以「釋疑」角度出發，考證《瑞應本起經》、《菩薩本起經》、《佛祖統紀》，及《釋氏稽古略》等，知悉釋迦牟尼佛出生為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B.C. 1027）四月八日；入滅涅槃時年為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B.C. 949）二月十五日；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道。史料的侷限也使島地有感於在印度歷史不記年時，佛教在印度幾乎無史，傳至中國，雖有《傳燈錄》、《高僧傳》、《佛祖統紀》等，卻皆止於宋明以上，未及清朝；日本亦僅有《元亨釋書》、《高僧傳》，寥寥無幾。以島地之見，佛教流布，經數千年及數大國，而未有一史貫通內外古今，豈不遺憾，故作此書。必須指出的是，島地聲稱「然事涉三國，文獻不足，紀有望洋之嘆故」<sup>34</sup>。據 1914 年村上專精在東京帝國大學教職員休息室的聽聞記載：

明治八年（1875）以來，國庫投入龐大費用，收集被隱沒於日本全國的史料，直至今日，已累積如山。然而，這些史料中，佛教史的材料就多達三分之二以上。<sup>35</sup>

引文可見，日本當時已開始注重歷史材料，傾國家之力搜集，也取得大量的佛教

<sup>33</sup> 呂澂，《佛教研究法》，頁 29、41。

<sup>34</sup> 島地默雷、生田得能合著，〈三國佛教略史〉，《佛學叢報》1（1912.10.1），頁 87。原書為島地默雷、織田得能（舊姓：生田）著（1890），《三國佛教略史》（上、中、下），東京：鴻盟社。

<sup>35</sup> 村上專精，《六十一年》，頁 294、297。

史料。於此判斷，村上在聽聞明治八年（1875）即開始進行蒐集史料工作的消息，於1890年成書《三國佛教略史》的島地，應該不知有此批史料，故才抒文獻缺乏望洋興嘆之慨。然若查閱明治三十四年（1901）至昭和十八年（1943）大藏省印刷局出版的《官報》，可發現「學事」一欄，持續刊載由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料編纂所出版的《大日本史料》之事。<sup>36</sup>這部受到佛學界重視的大部頭史料集，推測就是村上專精所說的傾國庫之力收編之史料集，當中，明治四十四年（1911）出版的第六編之十冊大量收錄與佛教相關的史料，由日本佛教史學會編輯的《佛教史學》也關注這一冊的佛教史料：「所謂南北朝的史實，傳統大多未廣為世間所知。……主要是因缺乏當時的史料之故。……在本冊見到與佛教相關的史料，豐富的驚人。」<sup>37</sup>照此推論，村上記述的史料彙編—《大日本史料》，正確是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才出版於世。

釋大醒（1899-1952）於1935年遊歷日本時，參觀了政府特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史料編纂所，據大醒記載：「這是日本的一個國史館。內部分十二部，部長就是史料編纂官，下面設有官補，現有編纂官十餘人，其餘辦事員一百多名。編纂之《大日本史料》，就好像我國之《二十四史》一類的史書。」大醒並請教編纂官鷺尾順敬關於佛教歷史的部分，是否特別分出？鷺尾回答：「日本的佛教是不能離開日本的文化的，所以在《大日本史料》中，佛教沒有特別分開。……現在編成的材料有二十萬點以上，關於佛教與中國文化的有過半數。」大醒不禁感嘆：「我國的各種史書上，把僧侶同道士女流放在末後，……。到了現代，中國的佛教不如日本的佛教受國家政府的尊崇和助力，也可以說全是受史書上編纂的影響。」<sup>38</sup>由此可見，近代日本的佛教研究，成果之所以如此豐碩，除了佛教學者的努力之外，日本政府也有一定的功勞。

永井龍潤（ながいりゅうじゅん）所著的《佛教歷史問答》，<sup>39</sup>由《佛學叢報》翻譯刊載，原書名為《通俗佛教歷史問答》，其宗旨表明：

本書題為《通俗佛教歷史問答》，其道理應可知，固然是以通俗為宗旨，卻非想博得知識份子一笑，而是想讓世間的初學者，能藉由此書得以了解佛教史全貌的話，我願足矣。

<sup>36</sup> 大藏省印刷局編，《官報》（東京：日本マイクロ写真株式会社，1901.5.1-1943.5.31）。

<sup>37</sup> 〈近刊の《大日本史料》〉，《佛教史學》1（6）（1911.9.1），頁87-88。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6編之10（1911），東京：東京大學。

鷺尾順敬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創立佛教史學會，並於1911-1914年主辦《佛教史學》雜誌。佛教史學會以「闡明佛教史與史實研究之關係」為宗旨，《佛教史學》主要揭載佛教史學研究的必要，收錄文章跨足印度、中國、日本，以及朝鮮等佛教歷史研究，內容包括各國佛教的歷史變遷、諸宗有名之高僧傳記，以及對近代佛教史研究的展望等。鷺尾順敬並於大正十三年（1924）擔任日本政府在東京帝國大學特設的「史料編纂處」編纂官，編纂《大日本史料》。

<sup>38</sup> 大醒（1936），《日本佛教視察記》，頁162-163，上海：行願庵。

<sup>39</sup> 因《佛學叢報》只出刊約兩年時間，故譯刊連載內容較長的日本書籍往往未刊完，幸而不足的部分可閱覽日本原書補齊。原書為永井龍潤（1902），《通俗佛教歷史問答》，京都：圖書出版株式會社。

鯨濤千里傳梵音：

《佛學叢報》與近代佛教歷史書寫轉型之日本因素／釋道禮

本書因過去以來，曾經發行過的佛教歷史書眾多，但卻曲高和寡，過於艱澀，對初學者來說不易閱讀，而且其所記載內容，大致上僅止於事實的列舉，不論及教理的如何。為略補其缺失，故編纂此書，將歷史與教理並列收錄，欲有益於初學者。……。

本書雖然列述印度、支那、日本的三國佛教歷史，此部只說明印度佛教史，其餘二國，請大家等待我隨後發行之。

此書以共兩百則的問答方式，鑒於過去佛教歷史書籍過於艱澀抑或缺乏教理論述。為補其缺失，試圖同時收錄佛教教義與歷史，故永井參考數百種書籍，編纂成這部以印度佛教為主，通俗卻又涵括佛教概貌的《通俗佛教歷史問答》。但若閱覽其內容，確實鉅細靡遺地解答了關於佛教在印度的起源與發展，然佛教傳入中國後，唐朝玄奘前往印度取汲經典並向印度論師學習佛教論典，以及繼玄奘之後，中印兩國佛教的文化往來與教勢等各種疑問，亦有解答，不失為一本初學者易讀的佛教參考書籍。

〈釋迦牟尼佛傳〉亦探究釋迦牟尼（Gautama，約 B.C. 565-B.C. 486）一生及其修行成就與教化的過程。作者並認為釋迦之學說，在當時印度是所謂的「新哲學主義」：

釋迦之主義，本於其哲學之基礎。其方便，依於宗教之機關。……示人間一切平等，以明有神說之謬妄，與四姓區分之非理，闡明善因善果、惡因惡果、自業自得之常理。……其新發明之主義，一言以蔽之，因緣生之三字而已。……釋迦以此新哲學主義，應於四諦十二因緣，而主張我空法有，以濟度一切眾生焉。<sup>40</sup>

引文所見，釋迦牟尼所處的印度，婆羅門等教盛行，釋迦牟尼以四諦十二因緣之說，主張眾生平等，試圖破除深根已久的印度種姓制度，故作者才會聲稱此為「新哲學主義」。值得注意的是，〈釋迦牟尼佛傳〉最終加入當時代進化主義的思潮，認為當時的日本佛教呈現衰退狀態，幸而「今改進之運氣，漸注於佛教家之眼光」，並指出「近來歐美之學士哲家，研求佛教者極夥，以佛家之合於科學，適於進化主義，未嘗與哲學矛盾」<sup>41</sup>。於此可知，進化思想從西方引進日本之後，佛教思想已開始與之作結合。

總結來看，《三國佛教略史》以清代王室盛行的藏傳佛教補足清代教史，亦因取得《朝鮮禪教考》而增添朝鮮佛教史，相較於過去的佛教史書，此書實質上跨足四國教史，各國佛教起源及重要年代變遷均詳考記載，其通史性質的廣度更顯完整。《佛教歷史問答》與〈釋迦牟尼佛傳〉，其二文共同關懷處，是近乎鉅細靡

<sup>40</sup> 日本慧若譯自「日本佛報」，〈釋迦牟尼佛傳〉，《佛學叢報》12（1913.3.1），頁 505-507。

<sup>41</sup> 日本慧若譯自「日本佛報」，〈釋迦牟尼佛傳〉，《佛學叢報》12（1913.3.1），頁 513。

遺地介紹佛教創立者與起源地，即釋迦牟尼與印度佛教，一方面論述佛教的傳佈與發展；另一方面藉與初期印度佛教相對比，反思當時明治時期，中國佛教和日本佛教的衰微狀態與振興之舉，這在處於民國初年動盪時局中的《佛學叢報》眼裡，不失為回溯佛教根源，知往鑒今地探尋未來方向的合適書籍。

## 五、結論

綜述所論，可以得知，1912 年由狄葆賢於上海創刊的《佛學叢報》，體現了近代佛教歷史書寫的轉型意識。近代中國受到西學的影響，佛教歷史書寫在傳統與現代交替的過程中，已由傳統的宗門與判教的撰寫型態，轉型成為具現代通史性質的歷史寫作方式。近代以來，日本借鑑西方人文科學研究方法研究佛教，成果頗多，並傳回中國，影響一代中國佛教學人。以此審視日本明治時期在西學衝擊下所作出佛教歷史的研究成果，影響一代中國佛教學者，佛教學者在研究佛教歷史並著其作時，常以日人著作的日本佛教書籍與研究成果為參考範本，亦奠定了現代佛教歷史書寫的基礎。

狄葆賢創辦的《佛學叢報》，選擇了日本的《三國佛教略史》、《佛教歷史問答》，以及〈釋迦牟尼佛傳〉翻譯刊載，其意義是於近代佛教的歷史書寫，在教科書性質通史化的寫作趨勢下，使讀者很快便能察其佛教歷史變遷的概貌。《三國佛教略史》擴充了鎌倉時期凝然所著《三國佛法傳通緣起》討論印中日三國佛教的範圍，增添了朝鮮佛教史，總合為四國佛教史；更異於凝然的宗派史觀，島地默雷與織田得能是以朝代順序來論述佛教歷史發展的變遷樣貌。《佛教歷史問答》則是一本以印度佛教為主軸，能提供初學者快速理解佛教整體歷史的常識書籍。〈釋迦牟尼佛傳〉是以婆羅門教盛行時的印度為背景，釋迦牟尼所創立的佛教，實為當時印度的新宗教，釋迦所提出的四諦十二因緣之學說，則被視為印度的新哲學主義。佛傳作者並指出近代歐美研究佛教者趨盛，尤以當時盛行的進化主義適於佛教之哲學學說為其主張，將明治時期由西方傳入日本的進化思想與佛教作一結合。

值得注意的是《佛學叢報》所收錄這幾本日書的相同點，均以印度佛教教史的發展變遷為討論重點，實可察析《佛學叢報》追本溯源，知往鑒今地探尋未來方向的重點所在。最終，近代中國佛教的歷史書寫，在日本文化因素的影響中，交融編織出近代佛教歷史觀的多元面貌。

## 參考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大醒（1936）。《日本佛教視察記》。上海：行願庵。
- 大藏省印刷局編（1901.5.1-1943.5.31）。《官報》。東京：日本マイクロ写真株式会社。
- 永井龍潤（1902）。《通俗佛教歷史問答》。京都：圖書出版株式會社。
- 村上專精（1903）。《大乘仏説論批判》。東京：光融館。
- （1914）。《六十一年》。東京：丙午出版社。
-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1911）。《大日本史料》第6編之10。東京：東京大學。
- 黃夏年等主編（2006）。《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 樸一乘主編（1912-1914）。《佛學叢報》，上海：有正書局；北京：有正書局；天津：有正書局。

### 二、中日文專書、論文、網路資源等

- （1911.9.1）。〈近刊の《大日本史料》〉。《佛教史學》1（6）。頁87-88。
- 商務印書館（1904-1948）。《東方雜誌》。上海：商務印書館。
- 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2005）。《梁漱溟全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日本慧若譯自「日本佛報」（1913）。〈釋迦牟尼佛傳〉。《佛學叢報》12。頁503-513。
- 包天笑（1990）。《鈞影樓回憶錄》（中）。臺北：龍文出版社。
- 末本文美士、松尾剛次、佐藤弘夫等編輯（2011）。《近代国家と仏教》。東京：佼成出版社。
- 朱迪（2013）。《試析《東方雜誌》關於宗教問題的報道與評論（1904-1937）》，吉林：吉林大學碩士論文。
- 呂澂（2009）。《佛教研究法》。黃懺華。《佛學概論》。揚州：廣陵書社。
- 村上專精（1895）。〈佛教史研究の必要を述べて發刊の由來となし併せて本誌の主義目的を表白す〉。《佛教史林》1。頁1-11。
- 阮仁澤、高振農主編（1992）。《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夏曾佑著，楊琥編（2011）。《夏曾佑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島地默雷、生田得能合著（1912）。〈三國佛教略史〉。《佛學叢報》1。頁83-104。
- 島地默雷、織田得能（舊姓：生田）著（1890）。《三國佛教略史》（上、中、下）。東京：鴻盟社。
- 荻野由之（1911）。〈佛教史研究に對する希望〉。《佛教史學》1（6）。頁51-53。
- 游有維（1988）。《上海近代佛教簡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 黃克武。〈梁啟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之追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2003.09）。頁181-213。

- 黃夏年（2007）。〈民國時期的佛教報紙——《稀見民國佛教文獻彙編（報紙）》序言〉。《法音》1。頁39。
- 楊曾文、張大柘、高洪著（2011）。《日本近現代佛教史》。北京：崑崙出版社。
- 道端良秀（1937）。〈「支那佛教史」の既刊書概觀〉。《支那佛教史學》1（1）。頁122-130。
- 潘光哲（2014）。《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蔣維喬（2013）。《中國佛教史》。北京：人民東方出版傳媒有限公司。
- 藍吉富（1993）。《中國佛教泛論》。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 嚴復著、孫應祥、皮後鋒編（2004）。〈與夏曾佑書〉。收錄於《嚴復集》補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 釋東初撰，中華佛教文化館、中華大典編印委員會同編（1970）。《中日佛教交通史》。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